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读《悲剧的必然性：

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

于 江

内容提要：《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是一部基辛格的传记，也是一幅描摹基辛格生活时代风云变幻、思想激荡的背景板。作者打破传统的时间线写法，选取基辛格人生中的大事和时代中的大势，试图本着辩证、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基辛格的政治生涯、外交决策及其背后的世界洪流一分为二地展开研究，对与基辛格相关的“悲剧的不可避免”、基辛格“均势”战略思想的由来和“忽视”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观进行挖掘，对当今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走向展开探究。该书虽有立场局限，但不掩学术价值。读者可以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态度从本书得到启示。

关键词：基辛格 悲剧 国家安全 程序民主 摩根索

一、一部“非典型”的基辛格传记

长期以来，对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研究一直处于“热运行”之中。

基辛格是现当代美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在快速演进的世界事务中具有长盛不衰的影响力。在其跌宕起伏的外交生涯中，基辛格赢得了举世的赞誉，同时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嘲讽乃至谴责。有关基辛格的论文、专著、传记所在多有，且佳作不断，广度、角度和资料丰富程度不一而足。

于江，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但作为基辛格的一部“非典型”传记，巴里·葛温（Barry Gewen）的近作《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¹仍然深具多重意义，获得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高度评价。

2023年7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并赞扬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作出历史性贡献的新闻在国内外媒体刷屏，凸显出这位近百岁高龄的老人、20世纪最有声望的外交家之一，依然保持着对世界事务演进的敏锐观察和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影响，并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呼应了葛温和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位传奇人物的关注。

这部被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誉为“结构精巧、论述无瑕”的大作其实结构很简单，分为前言和七个章节，共八个部分。前言部分讲述了此书的由来。该书摆脱了编年体的叙述方式，第一章的标题是《智利》，直接切入尼克松-基辛格组合以政治、经济、情报、军事等各种手段干预智利内政，特别是涉嫌卷入推翻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Allende）的系列历史事件。该章依托大量史料，讲述了美国为谋求自身“国家安全”不惜颠覆他国合法政府的“经典案例”，“委婉地”为基辛格受到的来自各方包括美国国内的道义谴责进行开脱。但那些直接或间接死于军事政变和镇压的智利无辜民众，他们是否能同意作者基于阿连德总统与卡斯特罗（Castro）的友好关系而可能在拉美推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假想分析呢？美国要确保自身绝对安全，是否就对美国政府插手他国内政、颠覆民选总统赋予了“合法性”呢？葛温自己倒是说了句大实话：崇拜“自由民主”对美国执政者确保国家安全的艰苦努力没有帮助，“智利案例”今后很可能会更多。

第二章是本书“非典型”意义开始呈现之处。葛温带着读者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但他并不去重谈希特勒的恶魔人性，而是从描摹希特勒作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政治人物”的崛起开始，观察思考议会制民主如何为希特勒铺就登顶权力峰巅之路，直接质疑“程序民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这一章也展示了少年基辛格在魏玛共和国亲历的悲惨现实。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三位著名的现代犹太思想者进行追踪叙事，回顾了他们为纳粹所迫、离德赴美的相似经历，点出他们作为尼采的信徒，不同程度上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贡献，巧妙地为基辛格毕生笃信不疑的现实主义厘清了时代轮廓和思想源流。尤为独到的是，葛温对包括基辛格在内的这样四位“非典型”美国移民的复杂矛盾心态进行了深入挖掘，展现了他们对美国这个拯救他们于毁灭的民主国家共同具有的感恩之心，也揭示出他们基于个人痛苦遭遇对美国现实的种种反思质疑。因为摩根索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奠基人与基辛格长期

¹ Barry Gewen, *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 Henry Kissinger and His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20.

保持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葛温干脆以“摩根索”命名第四章。

第五章全章讲述越战，因为这是现代美国外交受到的最严重冲击，犯下的最严重错误，留下的最深刻教训，这场战争也导致了摩根索与基辛格关系的破裂。摩根索虽然受聘为美国政府提供咨询，但他最早站出来，以他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巨大影响力，面向美国社会阐述介入越南战争的严重错误，并因此受到美国官方的抵制和打压。当基辛格担任首届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采取了为“体面撤出”而先扩大介入的策略。葛温在书中引用数据指出，在美军的58022名越战阵亡者中，有20552人死于尼克松-基辛格执政期间，¹这是美国为了“体面撤出”而付出的代价。对此，摩根索也义无反顾地批评基辛格，这导致两人绝交。以摩根索的理论设想和基辛格的现实实践共同推进的美国现实主义外交出现严重裂痕。葛温对摩根索的反越战立场并未过多评论，但他意味深长地引述了摩根索回忆肯尼迪总统曾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坐到我的位置上，会和我一样决策的。”某种“悲剧的不可避免性”以再现主题的方式跃然而出。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以基辛格掌权和离开权力为题，带领读者重温了基辛格的重要外交贡献，诸如对苏谈判、秘密访华、中东穿梭外交。鉴于基辛格在美国国内巨大的争议性，葛温没有正面品评其为人，但还是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带领读者追忆其一时荣光。比如，1974年1月，当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曝光，民意支持率跌破30%的时候，基辛格作为国务卿，却由于一连串外交成就个人支持率上窜到惊人的85%（一个当代西方政治人物再难企及的数字）。²有位国会众议员甚至提出一条宪法修正案，要求允许出生在国外的美国人竞选总统，以解决出生在德国的基辛格参选美国总统的问题。³

这两章涉及对基辛格学术思想和执政理念的核心评价。葛温结合实例，从更宽广的视野解析了基辛格“现实主义”的诸多实践原则，指明基辛格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其执政理念注重的是权力政治、实用主义和战略思维而不是意识形态。在展示基辛格直面惨淡现实的勇气和冷峻理智的风格时，葛温甚至暗示，基辛格曾经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损害美国外交长期坚持的道德传统和传教士热忱。

二、一部发人深省之书

作为《纽约时报》书评版的资深编辑，葛温深知如何建构一本站得住的好书，如何满足读者所需，并且他娴熟掌握引领读者的写作技巧。纵览全书，葛温依托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力图在哲学框架下和更深的智慧层面，

1 Walter Isaacson, *Kissinger: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488.

2 Barry Gewen, *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 p.292.

3 Barry Gewen, *The Inevitability of Tragedy*, p.292.

“客观辩证地”评价基辛格外交以及他那招牌式的“现实主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展现出了厚重的知识分子文风,深藏着为基辛格正名的用意,在认识深度、看问题角度、联系现实的紧密程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地标性成就”。

一方面,对特殊人群而言,该书深具必读性。正如葛温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批评的那样,当下的美国外交缺乏理性、连贯性和必要的长期洞察力;21世纪的美国外交更是从一个危机跳入另一个危机,目标不清,缺乏远见,至今某些具

基辛格招牌式的“现实主义”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均势,恰恰可以补美国外交之所需。

有影响力的人仍然不顾形势中明显的不利因素,执意把在全球推广“民主”作为美国外交的基础,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地想把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模式套用到今日俄罗斯或中国头上。葛温分析后认为,基辛格招牌式的“现实主义”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均势,恰恰可以补美国外交之所需。基辛格深具长远战略眼光,能从哲学高度和历史厚度透彻理解国际关

系,可以告诉美国人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或运转失灵的。基辛格也许被某些人从道义立场出发指责为“魔鬼”,但他的一生和他所从事的事业对美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葛温强调,美国人如果忽视基辛格将是愚蠢甚至危险的,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状态下尤其如此。基辛格退出公职四十多年来(1977年卸任国务卿)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擦亮自己的招牌(以便经营国际咨询),二是以各种方式给美国人讲授国际关系课。基辛格讲授的课可能因为不够突出意识形态而不符合美国外交界乃至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人的胃口,但这些课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葛温关心的是美国外交,念兹在兹的是通过此书唤起美国外交界特别是决策层的重视。考虑到中美关系今天的全局性、全面性和战略性,此书值得国际社会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特别是存在错误认识的人阅读。

另一方面,对普罗大众而言,该书颇具可读性。葛温这部基辛格传记的“非典型”意义恰在于此。基辛格的传奇人生历来广受关注,其青少年时期不幸的家世背景、颠沛的人生轨迹与成年后的傲慢性格、自信与不安全感并存的行事风格都曾被反复梳理,其中的联系也曾被认真挖掘。不论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这些闻名遐迩的大家,还是与基辛格叱咤风云同时代的观察家,都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他那些较年长的朋友们曾在纳粹统治下经历过一段成年生活,因而无法磨灭掉当时铭刻在他们心灵上的种种不堪回首的可怕印象。他们坚决认为,形成他性格的关键在于他在成长时期所遭受的那种残酷的、令人感到屈辱的丧失自由的苦痛。”¹基辛格既然在孩提时曾从纳粹德国的虎口逃生,自然很容易逐渐成为一个性情倔强、行动果敢的

1 [美] 查尔斯·阿什曼:《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页。

人。¹ 移民(逃亡)至美国后,由于家庭困难,基辛格从中学毕业后就白天在曼哈顿的一家工厂干活,晚上在纽约市立学院读夜校,直到美国参加大战,基辛格才从这种生活中解脱出来。² “1944年4月,基辛格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本营的第84步兵师。这一调动对基辛格来说,倒是一件幸运的事……在克莱本营的六个月,对基辛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六个月;同样,在西欧参加战斗,被任命为反谍报队的中士参谋而实际上是在海德尔贝格郊外的一个小镇充当指挥官的六个月,也是至关重要的。”³ 基辛格的军人生涯为他赢得了不少奖品,其中包括一枚铜星勋章和两张奖状。对于一个只有高中毕业学历的青年来说,这可算是很高的荣誉了。⁴

面对诸多方向“前人之述备矣”的局面,葛温另辟蹊径,不再从搜寻更多原始材料的方向做很可能徒劳的努力,转而下起哲学功夫,分析基辛格思考问题的立场方法如何形成,立足基辛格人性恶的基本信念延伸线索,推演出基辛格依循现实主义政治考量形成决策的施政逻辑;不再单向度地解读基辛格少年时期逃避纳粹迫害的经历以及大屠杀的惨痛记忆给他制定政策和执政行为留下的烙印,转而拓宽视野,研究20世纪上半叶德国犹太思想家受纳粹迫害群体逃亡与思想演进的历史。施特劳斯、阿伦特、摩根索三位人物都在20世纪思想领域留下深深的足迹,葛温以打破学科藩篱的勇气与技巧,把这几位著名思想家与基辛格交织穿插的个人遭际和思想发展线索带入对基辛格的研究,发掘出这些思想家共同对基辛格的“悲剧不可避免意识”和悲观敏感倾向产生的复杂影响,从而展示出基辛格性格养成的悲剧性时代。这就超越了对基辛格个人成长的深钻细研,而发掘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生成过程中犹太思想家群体性贡献的内在悲剧因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把握时代脉搏的某种大历史观。

一切关于基辛格的叙事,都对中国读者多一层意义,《悲剧的必然性:亨利·基辛格和他的世界》也不例外。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没有人不知道基辛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中国普通民众中,基辛格同样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葛温没有辜负中国读者的期待,精准写出了基辛格对周恩来总理那种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甚至超越敌对状态的外交风度的由衷赞美。

1 [美]查尔斯·阿什曼:《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第28页。

2 基辛格觉得他的白天是在一个工业性的工厂里度过的,晚上是在一个教育性的工厂里度过的。参见[美]斯蒂芬·R.格劳巴德:《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页。

3 [美]斯蒂芬·R.格劳巴德:《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第17—19页。

4 [美]马文·卡尔布、[美]伯纳德·卡尔布:《基辛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62页。

三、几点启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人民已经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起点，我们再读基辛格背负和参与创造的历史，不仅有助于从美国视角了解国际关系领域极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过去，而且有助于打开通向“如何搞好中美关系？”这道必答题的门径。

首先看国际大势。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对美国决策层某些人而言，国际关系似乎又走向现实主义的“历史夹缝”。意识形态冲突无法调和、霸权地位不容分享、“修昔底德陷阱势在必行”和“中美必有一战”等各种假想的噪声纷纷扰扰。但汲取基辛格对欧洲国家数百年来国运兴衰、强弱起伏历史的精深了解，立足于他亲身经历的世界翻覆和充满教益的世纪旅程，我们可以认为，前述的种种假想恐怕距离真正的现实都还很遥远。相反，现实是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政治家都必须摒弃盲目的自大、浅薄的乐观和短视的冲动，以信心、勇气和担当直面时代课题，作出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历史抉择。

其次看国际秩序。近代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一起诞生。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各国终于坐下来谈判签署和约，确立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打破了神圣罗马帝国凌驾于各国之上的中世纪格局，开启了近代国际关系史和近代欧洲外交史的新篇章。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列强在欧陆合纵连横，频起战火，封建王权之间互相征伐，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资本原始积累的贪婪无度驱动着欧洲国家在全球争城夺地、殖民扩张，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人类在连续遭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今天，终于迎来“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时代。¹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商讨确立的制度安排，保障了整个世界七十多年的和平与发展。某些美国自由派学者说，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起了以经济开放、多边合作、集体安全和民主联盟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经历过西贡撤退的基辛格恐怕最知道此种假说里含有多大水分。相反，联合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全球治理实践，具有举世公认的合法性和生命力，理应继续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这是保障国际秩序稳定的要害。

¹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1版。

再来看权力均衡。基辛格曾论述道,威胁一个国际秩序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合法性受质疑或权力均衡出现重大变动两方面。联合国的合法性不存在问题,无须多论。就权力均衡而言,冷战后,各国都不同程度得益于开放合作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世界维持了总体和平、较快发展的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连续发动战争,极大消耗国力,也把全球经济拖入2008年美国最先爆发的金融危机之中,自身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中国则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连续赶超发达国家,逼近美国年产出的四分之三。但美国以经济能力、资源蕴藏、军事实力、科技创新和主要国际货币发行权构成的综合国力仍然遥遥领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自信心动摇,既是自身内部治理困难上升与忧患意识加深复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国际体系权力的全球化再分配进程使然,远非中国崛起所导致。根据基辛格熟悉的“欧洲协调”历史经验,更多主权国家有序参与国际事务只会使全球均势更持久,国际协调更有效。某些美国人一门心思给本国树敌,用心险恶。

根据基辛格熟悉的“欧洲协调”历史经验,更多主权国家有序参与国际事务只会使全球均势更持久,国际协调更有效。

最后看看中美关系是否存在“悲剧的不可避免性”。中国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很多,也许会顺着葛温解析基辛格思想形成历程的方式,想到黑格尔(Hegel)那标志性的绝对化论断——“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幸而,以施特劳斯、阿伦特、摩根索、基辛格为代表的美籍犹太思想家,他们的德意志哲学背景受到20世纪的现实荡涤,已经突破了黑格尔过于绝对化、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家更不会被非黑即白、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桎梏束缚思想和手脚。

事实上,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破冰前的敌对、隔绝、互不信任和剑拔弩张,不知比今天严峻多少。但现实主义的大师们在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那改变世界的七天开始之初,进行了卓有成效、超高水平的战略“盘道”。在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关于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只谈“哲学”的记述生动深刻,极富启迪。熊向晖摘录1971年2月20日美国合众国际社电文称,尼克松对记者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他们是一些眼光看得很远的人。我自己对世界上的长期的和双边的问题的态度不是策略性的。美国领导人的眼光必须看得很远……这是我们国际关系的基础。”¹熊向晖认为,毛泽东显然从新华社及时编印的《参考资料》中掌握了这一重要动态。21日尼克松在基辛格陪同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直接提出谈话限于“哲学方面”,²极其巧妙地回应了美方不谈具体、日

1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2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72页。

常、眼前、策略性问题的考虑。毛泽东还提出请基辛格先讲，因为他是“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¹这次70分钟的会见，中美双方坦诚相见，直奔主题，只讲长远性、原则性、宏观性、战略性问题，一举奠定其后数十年两国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格局。

中美两国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双方再一次作出选择。但不论走多远，我们都不该忘记来时的路。一道回顾破冰历程对中美各界人士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回顾昨天，爱惜今天，启迪明天，是我们自然的生活态度；反思过去，明白当下，洞察未来，是人类特有的优良品质。习近平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²此话值得美国外交界去认真理解和思考，这有助于辨析清楚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论调。

笔者读完葛温大作的最大收获是，真正理解了基辛格关于“判断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他在黑白分明的形势下如何行事，而是看他如何驾驭模棱两可的复杂局面”之深意，管窥到基辛格之成为现当代美国外交传奇的奥秘在于，他学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对世界演进的表象内里的认识突破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正因如此，基辛格既不认同植根于美国社会深处的浅薄乐观主义和“少不更事”的盲目自信，也没有沾染某些美国人在冷战后那种宣称“历史终结”的狂热与亢奋。最后，谨以基辛格老先生的一句话致敬读者：“历史只有在回顾时才有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

1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69页。

2 《习近平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第1版。